

重点 阅读

重建文学的审美之维

——从《2016中国散文年选》说起

□陈世旭

年初,肖建国兄花城出版社命我选编《2016中国散文年选》,却之不恭,也正好借此机会与朋友们分享一下读书心得。我国的散文写作源远流长,浩浩荡荡。2016年的散文写作承续着这股源源不断的潮流。全书51篇,作者大都是我仰之弥高的大家名家,有耄耋前辈,更多是青春后生。徜徉其中,如沐春风,如洗灵魂,如蒙启示,真是享受。

在文字阅读面临挑战的当下,散文因其表达的明快和直接,仍然拥有着相对广泛的读者群。散文写作的参与者因此日渐增多,近年尤甚。小说家、学者以及其他非散文专业作者的散文风生水起,与“散文专业作者”争芳斗艳。

“散文专业作者”的说法,让我颇感困惑。就写作而言,小说、散文乃至各类文学体裁都不过是一种文字的操作。非要划出圈子,除去想要占山为王,毫无实质意义。俄国作家契诃夫笔下的《草原》、中国沈从文描绘的《湘西》,无论看作小说还是看作散文,都是很好的范本。“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小说”,这只是鲁迅使用写作材料的一种做法,很难说是区别散文和小说的界限。至于“小说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散文则帮助我们拓展人生”这样的话,就更让人费解了。试问,举凡文学,哪种样式的优秀作品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拓展人生”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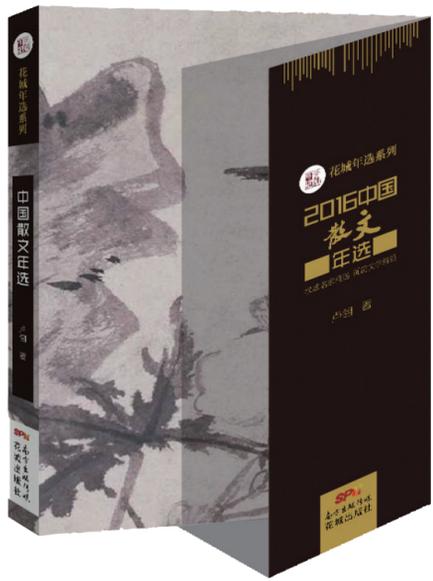
2016年的散文,写作的主力中不乏小说家的身影。作家们凭着独有的感性,沿着独特的通道,进入我们的心灵世界。这正如王国维所言:“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

中国文坛上,李国文是我最敬重的师长。我上世纪80年代初忝列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员,私心希望能当我的指导老师而未得,遗憾至今。缘故有二:一因其人,心地澄明,方正刚直,德高望重,让人敬仰,乐于亲近;二因其文,小说不必说了,成就卓著,就是那些闲散文字,也是三言两语,切中肯綮,蕴藉隽永。近十余年来,其散文写作已不再是小说写作的余兴,而是倾注了他巨大的精力。他在《文学自由谈》的专栏,谈古论今,纵横捭阖,以其深厚的学养和洞察世事的睿智,于混沌的时世激浊扬清。行文文字妥帖,各得其所,该说的说得充盈饱满,痛快淋漓;不必说的半句废话没有,空白处让你跟着会心一笑。于说古论今、嬉笑怒骂中,对中国文人的弊端痛下针砭,揭露真相,剖析劣根,毫不留情。这类文字,很容易读出鲁迅的味道。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这样的文字也许有些寂寞,但正因此而显得尤为可贵。

新时期以改革题材小说知名的作家蒋子龙近年来随笔写作极为活跃。其文字泼辣,凌厉,不掖不藏,保持着强劲的批判锋芒,让我们想起那些不该遗忘的民族伤痛。

韩少功、王安忆、张炜、迟子建,是新时期小说家中我极为仰慕的几位。韩少功、王安忆的小说因其思想和美学的力量,常常激动文坛,并引领着潮流。读他们的散文,同样可以清晰地感到其思想视野的开阔和哲学意识的深刻;张炜、迟子建的写作思如泉涌,高产优质。其立意的端肃和语言的诗性,以及萦绕在文字中的忧郁与感伤,总是让人在赞赏的同时止不住叹息。

邓刚斗嘴,是一种智力和语言的狂欢。他能言善辩,



张嘴就来,妙语连珠,滔滔不绝,看似嬉戏,人生至理在其中。叶兆言对掌故旧闻的娓娓解读,既有小说家的沉稳老到,更展现出家学渊源的深厚;毕淑敏是医生、心理师、作家,作品多与这些职业角色有关,对生活的诠释渗透着识见和温情。韩石山有文坛刀客之名,但偶尔也有一些婉约文字,让人洞见其内心的柔软。陈祖芬不老的童心、葛水平“爱与坚守都与山河有关”的乡土情结、郭文斌“让人们在最朴素最平常的生活现场找到并体会生命最大的快乐”的热心都那么让人感动。

2016年,中国文坛痛失两位大家。年选中收入的关于杨绛、陈忠实生前情状的文字,如话家常,深情款款,使两位为中国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作家,音容笑貌、道德文章,重现眼前。

理论批评和散文写作仅有一墙之隔。很多评论家的散文写作尤见功力。阎刚曾经以其气势如虹的文学评论在勃兴的新时期文坛叱咤风云,而今其面临的困惑,其实是整个知识界的困惑,“是百年来困惑民族的大难题”。还有几位文学评论家的散文都各见性情:阎晶明谈鲁迅与酒,“并非是小题大做的刻意为文,实在是一扇值得推开的窗户,可以看到一个复杂、微妙、微妙的世界”;任英康在《文学自由谈》当家多年,该刊评点文坛,亦雨亦晴,在逼仄的表达夹缝中游刃有余,他那些短小精悍的评语,尖锐而不致刻薄,俏皮而不致油滑,对语言分寸的拿捏和对火候的把握恰到好处;福建有深厚的散文传统,分别以理论家和小说家知名的南帆、林那北夫妇,散文同样成绩斐然,呈现各自的智性与活跃。

专门从事散文写作的作家们自是各见风采。李敖的文字之前读得不多,偶然接触,立刻为之震动。其审视和剖析历史人物的高屋建瓴、大气和才情,全无女性散文难免的小情调乃至脂粉气。后来有机会认识,

听到她坦率自白的“生就女儿身,心比男子烈”,证实了当初阅读文字的直觉。因为在故宫博物院做研究工作,祝勇有很多机会与真迹相遇。那种跨越时空的相遇,让他感觉特别震撼。他以扎实的艺术与历史功底,用散文笔法引领读者进入恢弘的古典艺术世界。他解读的《清明上河图》远不只是一般人看到的市井气息、繁华景象,而是命运的交叠、时间如水一样的不复还、繁华背后的凶险:“画中的那条大河,正是对于命运神秘性的生动隐喻。时间和命运,被张择端强化为这幅图画的重大主题”。

刘亮程的散文有一种梦幻的、轻盈的、飘逸的、似乎非理性的与乌托邦互生互长的审美特质。他站在返归原始的立场,以一种古老的感官体悟方式回到人类生活的环境和现场,以一种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不慌不忙地叙述或者说构建着一种人类久违的自然生存状态。周晓枫思维敏锐,识人论事一针见血。其文字的犀利恰如其人,独抒性灵、别出心裁,是考究、缜密和纯粹的书面语言,却率性而深刻。“草原创客”鲍尔吉·原野的文字干净而优雅,智慧而俊美,幽默而不失朴实,豪放而不失细腻。多年前,我在《小说界》杂志读到刘小川的《品中国文人》系列,记住了这个名字。他熟悉古籍,并善于以活泼的叙述使故纸堆中呆板的亡灵有了趣味。

三

散文作为一种最自由的文体,给予作家语言驰骋的空间是最大的。散文品质的高下,除了内容上的真善美抑或假恶丑可以作为基本的衡量标准,追求理性与敢于感性、精雕细刻与大刀阔斧、冷静叙述与热烈抒发、沉稳练达与灵动率真、简洁明了与扑朔迷离、口语化与书卷气、小女人的顾影自怜与大男人的心雄万夫、浅斟低唱的婉约与铁板铜琶的豪放、精致唯美的歌吟与自然质朴的言说,孔子的辞达而已与庄子的汪洋恣肆、含蓄收敛惜墨如金与激情澎湃语言狂泻,乃至思想抵达的深浅,学养积累的丰厚,事实上都并不能决定散文美学意义上的优劣。作家个人自可有各自的个性,读者诸公自可有各自的喜好,然而,对散文写作的整体面貌而言,却无疑是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好。并立并存是正常的,扬此抑彼是狭隘的。正因此,我们今天的散文阅读才如入山水胜境,峰回路转,皆有可观,万紫千红,目不暇接。

纵观文学史,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最可让当代散文界振奋的是,一大批中青年作家极大地壮大了散文写作的队伍。他们的文字坚实、真挚、灵气逼人、生气勃勃,以各自的生命体验、各自的视角和心智、各自的特征和实力,对生活和生命现象作出了富于内蕴的理解和诠释。正是他们的才华与努力,决定着中国散文的现实与未来。

某些哲学家所持的现代工业社会“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的观点,我们也许无法同意,但现实生活中“艺术的大众化和商业化导致人和文化的单向度”,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一种事实。强调文学既是一种美学形式又是一种历史结构,是充满诗情画意的美的世界与渗透价值意义的现实世界的统一,重建文学艺术的“审美之维”,促成整个的人的再生,始终是时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所选编的2016年的散文因其卓然的风格、自成的风韵在文坛林林总总的消费文化群落中呈现出了属于自己的标识。

从容咀嚼缭乱的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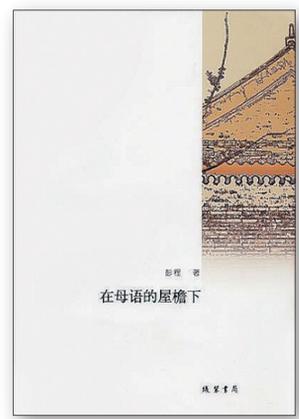
——读彭程散文集《在母亲的屋檐下》 □古 昶

书香茶座

读罢彭程散文新著《在母亲的屋檐下》,脑间浮现《北史》中的一句名言:“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生活也。”彭程这本散文集最可贵的品质,正在于其艺术世界的自由机杼和自成风骨——无论整体取向抑或具体行文,都呈现了属于作家自己的个性化特征。

进入新世纪以来,许多成熟敏感的散文家,都日益深切地感受到来自网络媒体和电声技术的强力裹挟。为此,他们开始调整自我,以求突围。在这方面,散文家一个多见的举措就是,强化语言艺术便于实现的“深度”和“长度”,以抵御和反拨数字传播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感官化、浅表化与碎片化。这些年来,文坛上锁定某一题材或主题,做系列化、工程化开发的“大散文”屡见不鲜,其深层原因庶几就在那里。但是,彭程并没有像时下倾向新变的同行那样,用主要精力来构建集中稳定的题材领域或话语主题,而是选择了一种更接近散文传统特征与既定优势的叙事策略,即一种自由洒脱、流动不羁的行文风度,一种丰富多彩、摇曳多姿的言说方式,一种因境生情、随物赋形的表现手法。用作家在《后记》中的话来说,就是让心灵和笔墨,“随风飘荡,任意东西,从变动不居的风景中,感受各自的美,收获一份惬意和陶醉”。

对此,彭程留下了认真而坦诚的“夫子自道”:有成就的散文家,往往是“目光专注,精神凝聚,各自选择了自己最感兴趣也最具实力的话题范围,既穷追猛打,又精耕细作”。“我虽然向往这样的写作,但并不属于这类写作者”,我“仿佛步入了一座紫紫嫣嫣开遍的园林,每一朵花我都想看一看,凑上前闻闻它的香气,但须臾



间目光又被另一朵吸引了,脚步也挪移过去。仿佛驿路看花,眼花缭乱,丰富多彩,但过后寻思,却不免有浮泛之感”。在我看来,彭程并不缺少发现和驾驭“目标题材”的资质与能力。他选择“驿路看花”式的自由观赏与任意挥洒,应该是听命于内心的结果。透过一篇《童年乡野》,不难发现,孩童时期的彭程就充满了超常的好奇心和探求欲,就总是被大自然中新鲜的、未知的事物所吸引、所陶醉。《在母亲的屋檐下》的“驿路看花”,正是作家这种精神驱动力的外化。这种无拘无束、随机生变的表达,支撑起作家对一个时代的圆通观照与多维把握,便于作家真正呈现这个时代的精神流变与心灵图谱。

立足生活前沿,为一个正在经历巨大发展变化的时代传神写照,这是历史赋予

当代散文的使命。然而,散文家要真正担负起这一使命,却绝非易事。对此,彭程自有清醒的认识:“技术的飞速发展,让我们时时刻刻面对新事物,享受种种便利和好处,眼花缭乱,心满意足。但与此同时,内心的感受也被切割得凌乱、无序、碎片化。”(《连续》)为了在缭乱的语境中守望文学的使命和尊严,彭程主要付出了两方面的努力:

首先,在参与恢弘壮阔的时代交响时,坚持从已有的生活与生命体验出发,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努力实施个性充盈的艺术建构。一部《在母亲的屋檐下》熠熠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只是细加分析,又可发现,彭程在营造这种色彩时,既没有一味追踪社会新闻事件,也不曾极力趋附当下流行话题,而是把这一切天然无痕地浸透于自己日常的社会视域和生活天地,化作一系列饱含深情的故事和细节,作烘云托月式的表达。例如,《返乡记》一文描述作家陪友已定居京城的父母回河北老家探访亲友的情形。其直接勾画的场景无非是亲人团聚、老友重逢、同学畅叙之类,然而,就是这些看似寻常多见的场景,却偏偏承载了异常密集的社会信息与生活密码,其中既有人生的命运的转机、生存环境的改善,又有民生状况的隐忧、职场氛围的诡谲。于是,我们感受到真实的、多色调的时代潮涌。还有《行走京城》《在生松草的地方》《小周》等篇,或聚焦身边的都市,或采撷远方的风景,或打捞城南旧事,或速写凡人小景,尽管题材和对象不同,但同样都做到了透过作家的心理来传递时代的聲音,因而显得具象生动,真切感人。彭程说过:讲述中国故事“是一个集体

性的文学工程,仿佛一气势宏大的交响乐,但每一位散文作家又都是个体性的存在,有着专属的内容和表达方式,他仿佛乐队中的一位小提琴手或者一名长笛手,他的声音,只能是恢弘声响中的一道旋律”。我想,彭程正是这样一位善于以个性化旋律参与时代交响的小提琴手。

彭程的散文创作注重生活的感受以及表达的感性,但是却不曾因此就满足和停留于现象的臆测与形象的复制。在这一维度上,作家的另一种努力同样昭然显豁:坚持对缤纷驳杂的社会景观与生活现象,做冷静的审视和睿智的思考,调动创作中知性的力量,抵达事物的纵深地带,在其中发现固有的价值或本真的存在。例如,《在母亲的屋檐下》一文,由方言说到母语,透过一系列有关方言现象与桥段的灵动诠释,多层次地展现了母语对人的亲近感、归属感和家园感,精辟地揭示了它对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延续的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且认他乡作故乡)以作家的切身体验为依据,指出了生活中日益多见的“第二故乡”乃至“四海为家”现象。这固然反映了现代人乡土观念的变化,但更重要的是,破译和倡导了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一种开拓进取的主体意识。《招手》《对坐》《远处的墓碑》三篇作品,围绕父母双亲和岳父拉开笔墨。其中的亲情书写自是细腻、柔婉、含蓄、别致,令人心动,而由此引发的“我”对生命真味的仔细体察,对人生规律的清醒直面,更是启人心智。应当承认,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对时代的了解与认知,同时也显示了彭程面对缭乱风景依然具有的把握一个时代的能力。

■新知新思

海南岛在汉代已设置郡县,并入中央帝国的版图,但仍是“天高皇帝远”,与中原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和时密时疏的状态,于是才有南北朝洗夫人率1000多黎洞归顺朝廷的故事。没有疏离,何来归顺?

北宋以后,在蒙古、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的挤压之下,华夏文明中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偏移,朝廷对海南的控制和渗透渐次加强。特别是从明朝开始的大批移民,沿东南沿海推进,渡过琼州海峡,汉人群落在海南形成了主导地位。“闽南语系”覆盖闽南、台湾、潮汕以及海南,给这一次移民留下了明显的历史痕迹。丘浚、海瑞等一批儒臣,后来都是在闽南语的氛围里得以成长。

至此,海南最终完成了对华夏的融入,成为了中原文化十分重要的南向延伸。但观察海南,仅仅指出这一点并不够。处于一个特殊的地缘区位,海南与东南亚相邻、相望,与南洋文化迎面相撞,同样伏有南洋文化的血脉。所谓“南洋”,就大体而言,“南”者,华夏之南也,意涉岭南沿海以及东南亚的广阔地域,其主体部分又可名之为“泛印度支那”,即印度与支那(China,中国)的混合,源自南亚的伊斯兰教与源自东亚的儒学在这里交集并存,包括深眼窝与高颧骨等马来人种的脸型,显然也是印度人与中国人在这里混血的产物。至于“洋”,海洋也,从海路传入的欧洲文化也,在中国人的现代词汇里特指16世纪以后的西风东渐,既包括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第一批海洋帝国的文化输入,也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第二批海洋帝国的文化输入。“洋火”、“洋油”、“洋葱”、“洋灰(水泥)”等,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留下的各种新词,很早就被南洋居民习用。

眼下从中原来到海南,人们会常常发现岛上风物“土中寓洋”。街市上的骑楼,有明显的欧陆出身,大概是先肇侨民从海外带回的建筑样式。排球运动的普及,同样有明显的欧陆烙印,以至文昌县成为全国著名的“排球之乡”,几乎男女老少都熟悉这项运动,对太极拳与少林拳倒是较为陌生。还有语言:“老爸茶”频频出现于海南媒体,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爸”是bar的误译。体育习语如“卖波(我的球)”、“奥洒(球出界)”,当然也分别是my ball with out side的音译。如有人从事跨语际比较研究,肯定还可在海南方言中找到更多隐藏着英语、法语、荷兰语——虽然它们在到达海南之前,可能经过了南洋各地的二传甚至三传,离原初形态相去甚远。

有些历史教科书曾断言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一直“闭关锁国”,其实这种结论完全无视了汉、唐、元、明等朝代的“国际化”盛况,即使只是特指明、清两朝,也仅仅适合于中原内地,不适合同属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当年郑和下西洋,并非一个孤立的奇迹,其基础与背景是这一地区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越洋移民,一直在对外进行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和商业交往,并且与东南亚人民共同营构了巨大的“南洋”。据说海南有300多万侨胞散居海外(另说为500多万),足见当年“对外开放”的力度之大,以至于现在还有海南人,对马尼拉、新加坡、曼谷、西贡的街巷如数家珍,却不一定知道王府井在何处。

南洋以外还有东洋,即日本与高丽。两“洋”之地大多近海,其中相当一部分,曾是中央帝国朝贡体系中的外国,受帝国羁制较少,又有对外开放的地理条件和历史传统,自然成了16世纪以后亚洲现代化转型的排头兵。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西方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理念广为流播之前,亚洲多数国家的管辖边界和主权定位并不怎么清晰,海关、央行、国籍管理等诸多国家体制要件尚未成熟——以至于中、越两国的陆地边界到20世纪末才得以勘定签约。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最初以南洋为基地,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场革命以改造中国乃至亚洲为目标,但最初完全依赖南洋的思想文化潮流、资金募集、人才准备,几乎就是南洋经济和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政治表达——海南的宋氏家族以及黄埔军校里1000多海南子弟,自然成为了革命旗下活跃的身影,其倡导现代化的纷纭万象,非后来的海南人所能想象。南洋人民相互“跨国革命”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侨民们穿针引线 and 里应外合,新派人士天下一家,与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的各国联动颇为相似,直到反美的“印支战争”期间仍余绪未绝,比如在胡志明的人生故事里,国界就十分模糊。

不过,“民族国家”的强化趋势不可遏止。这是孙中山革命阵营的进一步扩大。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细节:孙中山先生正是在获取内地各种革命资源之后,才放弃了文明棍、拿破仑帽、西装革履等典型的南洋侨服,创造了更接近中国口味的“中山装”。他肯定有一种自觉:穿着那种南洋侨服,走进南京或北京是不方便的。也就是从这时开始,随着民族国家体制的普遍推广,东方巨龙真正醒过来了,只不过这一巨龙逐渐被分解成中国龙、越南龙、泰国龙以及亚洲其他小龙。九龙闹水,有喜有忧。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地后来一再发生恐怖的排华浪潮,而中国岭南地区的很多革命者,也曾“里通外国”、“地方主义”、“南洋宗派主义”一类罪名下,多次受到错误政治运动的整肃。作为一个民间性的共同体,“南洋”已不复存在。“南洋”不再是一个温暖的概念,而是一段越来越遥远并且被人们怯于回忆的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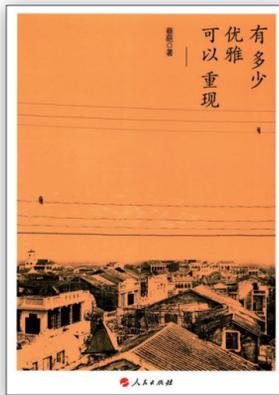
南洋历史,南洋与中原的互动历史,还有南洋与中原互动历史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其实都是了解中国与世界的重要课题——其研究需要更多人投入。眼下,随着欧洲殖民主义从香港和澳门最终撤走,随着“10+1”(东南亚十国加中国)互助蓝图的展现,随着经济跨国化与文化的全球化的大浪汹涌,重提“南洋”恐怕并非多余。这并不是要缅怀往日中央帝国的朝贡体系,而是在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外,获得一种人类共同体多元化与多样化的知识视野——还有善待邻人与远人的胸怀。

海南作家蔡葩是个有心人,近年来避开某些文化时尚的喧哗,潜心搜寻和辨析历史的残迹,一心把过去的时光唤醒,写出了《有多少优雅可以重现》一书。在她深情灌注的笔下,一个个曾经生活在南国椰岛的学者、军人、医生、渔民、名媛、富商,终于抖落岁月的尘埃,走出遗忘的暗层,与当代读者实现了迟到的相认。细心一些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些人的故事发生在陆之南和海之北,既凝结着内陆文化的千年重负,又集聚着南洋文化的八面来风;既连接了文化的世代更迭,又横跨了文化的地域板块——他们与内陆和南洋都有诸多血缘的、经历的、知识的、习俗的联系,使他们在动荡的整个20世纪见证了特有的交汇和挤压、特有的爆发和沉寂,还有非同寻常的欣悦与悲凉。他们在历史中匆匆掠过的身影,不能不使我们掩卷之时,两目空茫,一声叹息。

这当然还谈不上是一本完整而详实的南洋史,但历史从来就是人的历史,更是普通人的历史。蔡葩的写作,也许就是重新找回南洋的一个开端。这个开端所指向的各种人生远岸,还有众多普通人思想和情感的纵深,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寻和想象。

再说找回南洋

□韩少功



有多少优雅可以重现